

一九九三年的中共外交：挑戰與對策

張雅君

(本中心副研究員)

摘要

一九九三年中共同美英法三大西方國家均呈現嚴重齟齬，同時中共也面臨了「中國威脅論」，以及西方國家評估其經濟實力僅次於美日的困擾，為防止可能對自身安全與發展產生不利效應，中共高層首腦積極不斷的在國際場合澄清上述論調。針對美英法三大國家對中共在主權利益上的侵犯和挑戰，中共係以彈性區隔的「既聯合，又抗爭」策略作為對應，同時強化同其他西方國家，尤其是德國的關係，以作為平衡；此外，中共也繼續加強同亞太周邊國家如印度、越南改善關係，並且鞏固同東協、東北亞及俄羅斯的友好關係。為確保在第三世界的聲望，以及打壓台灣的生存空間，中共亦繼續在非洲和拉丁美洲進行頻繁外交活動，爭取與國支持。

一、前言

在東歐與蘇聯共黨陣營相繼解體後，中共社會主義政權在一九九〇年代面對的國際環境更加嚴峻，西方國家在重建世界新秩序的過程中，對中共體制與價值體系的挑戰日趨嚴厲，中共也針對此種挑戰展開積極的對抗。質言之，進入一九九〇年代後的國際體系刻正呈現的是西方世界與中共在重建冷戰後國際新秩序上的對抗，在一九九三年，此種對抗的過程仍然持續進行中。在此對抗架構下，中共仍延續一九九二年的全方位外交取向，以確保其安全利益與經濟發展利益。

以下茲就一九九三年中共對外政策上所面臨的來自於西方世界挑戰的新發展，以及中共的對策作一分析與評估。

二、「中國威脅論」的挑戰與中共的反應

蘇聯在一九九一年底的走向解體不可否認對中共具有重大衝擊，然從一九九二年中共的表現看，短期內中共並沒有步上蘇聯後塵的趨勢，除了政治上相對穩定，社會控制依舊嚴密，以及外交政策上的務實取向等原因外，最重要的是中共始終未放棄有助於改善民生的改革開放政策。中共經濟在近五年來平均每年均以百分之七點九的速率不斷增長^①，尤其是一九九二年初鄧小平的「南巡」講話被公開傳達後，改革開放的聲勢再度擴大，使得中共經濟在一九九二年的增長超越百分之十，中共民生產總值也達二萬四千億人民幣，此種高速增长趨勢仍延續至一九九三年，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七月的統計，在上半年中共民生產總值就已達一二、六四七億人民幣，比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十三點九，其中工業生產從一九九二年七月份以來已連續十二個月增長速度在百分之二十以上；今年上半年工業總產值更比去年同期成長百分之二五點一^②。

問題是此種過於快速與高速的經濟增長趨勢也同時為中共帶來不少困擾。在對內環境方面，高速增长導致大陸各地經濟發展過熱與嚴重通貨膨脹、信貸膨脹的亂象，迫使中共高層在七月不得不採取鐵腕手段實施宏觀調控；在對外環境，西方國際也震驚於中共此種發展，不得不正視中共崛起的事實，更關注中共未來在國際中的角色取向^③；部分對中共持較悲觀與憂懼的人士憂慮中共可能將鉅大的經濟成長實力轉化成對鄰國與西方國家具有威脅性的軍事力量。中共自一九九一年起再度增加國防預算，並且向俄羅斯採購二十四架SU-27先進戰機的事實，似乎證實了以上假設與憂慮，因此自一九九二年下半年始，所謂「中國威脅論」的說法在國際間甚囂塵上。另外，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又在一九九三年「世界經濟展望」的報告中，把中共列為世界第三大經濟實體，僅次於美國和日本；主要原因是世銀改變了以往的計算方法，而以「購買力平價法」重新計算出中國大陸人民平均國民生產總值為一千六百多美元，較諸世銀以往算出的三六八美元足足高出四倍有餘^④，中共因此遽爾搖身一變為「經濟超級大國」；不論世銀此項高估是否客觀正確，但也顯示西方國家不願再輕估中共的經

① 李鵬，「政府工作報告——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五日在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新華月報（文獻版）（北京），一九九三年四月，頁

一三。

② 「大陸上半年經濟發展概況」，中共對外經濟研究（台北），第四一二期（民國八十二年九月一日），頁二一。

③ Nicholas D. Kristof, "The Rise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Washington D. C.), Vol. 72, No. 5, Nov./Dec. 1993, pp. 59-61.

④ 邊匯，「中國是超級大國嗎？」現代中國（北京），第十一期（一九九三年十一月），頁一〇——Nicholas D. Kristof, *ibid.*, p. 63.

濟發展潛力，而對於「中國威脅論」的積極主張者而言，世銀的評估報告無疑是一項相當有力的根據。

自「六·四」事件以來，極力反對孤立中共或制裁中共的西方人士所持的主要理由即：一是中共擁有鉅大的市場潛力，二是西方企業界在中共持續增長中具有的重大經濟利益，這項理由事實上也導致西方國家對中共的制裁無法持續。然而，在一九九三年卻出現以上一方面視中共的經濟增長有利於西方，一方面又視中共的經濟增長可能威脅西方的矛盾論調，其主要的意義在於反映了西方世界在後冷戰時期威脅認知的轉移，進一步言之，蘇聯解體使中共替代蘇聯成爲西方認知新的威脅來源，此種認知的第一項基礎無疑是體制與價值系統的差異。馬列政權曾不斷宣示的埋葬資本主義與西方政治社會之理念，曾經是導致東西冷戰四十年的主要原因，因而蘇聯解體後，中共在推動經濟自由化，並已取得鉅大經濟增長成就的同時，卻在政治體制上仍力圖保持馬列政權的形式與實質存在，就難以消弭西方世界的歷史性恐懼，西方也無法接受中共領導者不斷宣稱「世界體系應多樣化，應容忍多種制度並存」的說法。第二項認知基礎是國家利益，近幾年來，中共對主要西方國家如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及歐洲共同體的貿易都出現巨大的順差（見下表），此早已成爲中共同主要西方國家間的一項重大問題。從目前中共經濟增長的趨勢已經顯示，中共十二億人口所累積的經濟生產能量已日漸展現效果，因此西方擔憂，在龐大人力支持下，中共設若持續推動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並在政治上保持相對穩定的話，則二十一世紀中共勢將成爲經濟巨人而削弱西方對國際體系的優勢主導地位^⑤。

認知往往是決策或是具體作爲的前提和依據，固然「中國威脅論」僅反映了部分西方人士的認知與憂慮，但由於此種論調建立在部分事實性基礎上，因而其仍可能對西方政府和國會的中共決策過程產生關鍵影響。最重要的是通過西方輿論的廣爲散播，「中國威脅論」對中共現階段的發展具有相當大的不利影響，包括：可能刺激亞太國家原已存有的恐懼中共情結，進而產生新的對抗中共之聯盟，使得亞太區域再度陷入緊張不安；可能影響西方國家對中共的投資、技術轉移與高科技產品的出口；可能影響中共加入GATT的談判進程，以及中共在GATT中所享有的優惠地位；更可能引發西方對中共出口的嚴厲限制與貿易報復等，質言之，「中國威脅論」的效應若持續擴大，不僅破壞中共國際形象，最終更可能破壞中共近年來致力同周邊國家改善關係，以及廣泛追求經貿利益的外交政策目標。

基於此，中共在一九九三年的一項重要作爲就是積極廣泛的向國際澄清「中國威脅論」，除頻繁通過國內和港澳媒體批駁外，中共高層首腦江澤民、李鵬、朱鎔基、錢其琛等人更廣泛引用會見外賓、記者會及參與重要國際會議的機會主動公開澄清，中共首腦們指責「中國威脅論」毫無根據，是西方霸權主義不願中國實施現代化，不願看到中國強大繁榮而刻意製造

^⑤ Nicholas D. Kristof, *Ibid.*, pp. 61-63.

最近三年（一九九〇—一九九二年）主要西方國家與中共貿易結構形勢

（單位：百萬美元）

貿易國	美 國	英 國	法 國	德 國	義 大 利	荷 蘭	歐洲共同體	
一九九〇年	貿易總值	11,767.8	2,026.9	2,308.4	4,971.1	1,904.8	1,307.4	14,180.7
	輸 出	5,179.5	640.3	645.4	2,034.4	835.0	908.3	5,830.4
	輸 入	6,588.3	1,383.9	1,063.0	2,936.7	1,069.8	399.1	8,350.3
一九九一年	貿易總值	14,201.5	1,699.2	2,304.7	5,404.3	2,389.9	1,492.0	15,140.7
	輸 出	6,193.7	727.6	732.9	2,355.6	931.9	1,062.7	6,738.9
	輸 入	8,007.8	941.6	1,571.8	3,048.7	1,458.3	429.3	8,401.8
一九九二年	貿易總值	17,493.5	1,936.4	2,260.5	6,471.0	2,843.3	1,708.5	17,414.1
	輸 出	8,593.7	922.8	763.5	2,448.0	1,095.2	1,200.3	7,601.5
	輸 入	8,899.8	1,013.6	1,496.5	4,023.0	1,748.1	508.2	9,812.6

從此表可以看出，除荷蘭外，中共對美、英、法、德、義及歐洲共同體的進出口貿易均呈現出超。資料來源：「最近三年（一九九〇—一九九二年）中共對外貿易地區及主要貿易國家結構形勢」，載於《中共對外經貿研究》（台北），第四一四期（民國八十二年十月一日），頁四四—四八。

的「陰謀」。錢其琛更不斷以具體數據指出同西方國家比較，中共軍費是低水平的，是防禦性的，錢其琛更否認中共有意填補亞太權力真空^⑥。朱鎔基也在一九九二年九月透過衛星視訊對參加環太平洋論壇各國代表發表演說時，強調中共對亞太地區絕無擴張野心^⑦。另外，中共傳播媒體也不斷引用亞洲，尤其是東協國家政治領袖所發表的片斷對中共正面評價之觀點來揭露西方的陰謀^⑧。

此外，中共也極力糾正世銀對中共經濟實力的不實評估，中共「國務院」總理李鵬於一九九三年八月接受墨西哥太陽報採訪時指出，中共經濟確實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但中共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口多、底子薄，要趕上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還需幾十年的努力^⑨，錢其琛在十月的聯合國大會發言中亦申述同樣的觀點，指出中共的經濟取得豐碩成果，固是客觀事實，但過高的估計中共的經濟水平亦不符合實際^⑩。

三、對西方區隔處理的彈性對策

在「中國威脅論」的陰影下，中共在一九九三年同西方世界的關係自然難以平靜順暢，尤其是中共同美、英、法三大西方國家間均呈現嚴重齟齬。

首先在同美國方面，中共在進入一九九三年一開始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即美民主黨籍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於元月二十日入主白宮，由於民主黨在人權與民主理念上素來較具理想主義色彩，而柯林頓在競選期間亦附和民主黨國會議員，主張對中共最惠國待遇應附加條件，因而中共在一九九三年立即面對美國是否無條件續延最惠國待遇的問題，同時在府會俱為民主黨控制的環境下，中共也在人權、軍售與貿易逆差上面對較以往更為強勁壓力。雖然柯林頓基於現實利益的考慮，而在五月底以行政命令宣布無條件續延中共最惠國待遇一年，但提出中共必須改善人權以作為明年度是否無條件續延的參考，這使得北京和華府在人權問題上仍爭執不休。在八月，美國以中共對巴基斯坦出售M-11飛彈的理由而宣布停止對中共的高科技出口，以作為懲罰。隨後不久，美國根據情報部門資訊，懷疑中共駛往伊朗的貨輪「銀河號」載有化學武器而逕行

⑥ 「錢其琛談國際形勢和我國對外政策」，人民日報（北京），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第一版。

⑦ 中國時報（台北），民國八十二年九月八日，第十一版。

⑧ 亞倫·懷丁（Allen Whiting），「中共向西方澄清中國威脅論，忽略亞洲鄰國」，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二年五月三日，第十版。

⑨ 文匯報（香港），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一日，第二版。

⑩ 「錢其琛在聯合國大會發言」，文匯報，一九九三年十月一日，第九版。

在公海對「銀河號」實施攔截檢查，但並無所獲，致使「中」美雙邊關係又再度陷入緊張。

其次在同英國方面，由於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於一九九二年十月推出加快香港民主化的「政制改革方案」，導致「中」英關係惡化。中共認為彭定康此舉明顯違反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不利於香港過渡期的穩定，其責任在於英方，然而彭定康仍堅持原則不願妥協，致使「中」英雙方自四月起重開的有關「政制改革方案」的談判毫無結果，而英方基於加快推動香港民主化的決心，不願與中共談判的可能結果，而支持香港立法局憲制小組於五月三十一日開始討論港督的政制方案，此引起中共強烈不滿^⑪，中共談判代表甚至揚言報復，「中」英雙方關係因此在一九九三年一直陷於緊張狀態。

其三在同法國方面，中共也因為法國在一九九二年對台出售幻影兩千戰機而在年底關閉法國駐廣州領事館作為報復，雙方關係因此在一九九三年初即陷入低潮，雖然中共在七月接受法國政府總理特使弗里德曼訪京，表達重建「中」法關係的願望，但前提是希望今年上台的巴拉迪爾政府能糾正前政府對台軍售的錯誤決定^⑫，熟料法新政府反於十月同意決定對台出售價值約二十六億美元的海軍武器，中共因而再度對法政府提出嚴厲警告^⑬，「中」法關係的恢復與發展一九九三年因此成為泡影。

事實上，美英法三國一九九三年對中共所作的種種挑戰，不論其出發點是價值理念，或是現實利益的考量，但對中共言，所有的挑戰點全都涉及到中共的主權利益，然而中共係以區隔對待的雙重標準對策來回應美英法三國的挑戰，進一步言之，在對美國干涉中共內政，侵犯中共主權的回應對策上，中共表現的往往是口頭強硬，但行動妥協的態勢，例如柯林頓五月以行政命令要求中共改善人權，八月宣布對中共實施經濟制裁等作為，中共均頻繁通過政府管道或媒體向美強烈抗議，並揚言報復，但最終均不了了之，甚至「銀河號」事件，中共要求美公開道歉賠償未果，最終僅以強烈抨擊美國霸權主義收場，至於布希前總統宣布對台出售F-16戰機事件，中共也僅止於向柯林頓政府口頭恫嚇而已；對照來看，中共在同英國與法國的爭執上，其回應行動較為強烈具體；換言之，中共對英法較會以實質的報復行為宣示其主權與不干涉內政的原則。

中共採取雙重回應對策的明顯可見原因是，美國是超級大國，更是中共西方世界中最重要貿易夥伴，近幾年來，中共對外出口總額中，對美國的出口就佔約十分之一，僅次於香港與日本^⑭，因此中共無法冒犧牲鉅大經貿利益之險而率爾對美採取激烈抗爭行動；事實上，在一九九三年中共仍把同美國實質性改善關係視為重要外交目標，從三月到五月，中共為確保

⑪ 人民日報，一九九三年六月四日，第四版。

⑫ 人民日報，一九九三年七月十六日，第四版。

⑬ "Beijing Holds Talks with Prits to Improve Relation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 Kong), Dec. 9, 1993, p. 2.

⑭ 「一九九二年中共對外貿易統計分析」，中共對外經貿研究，第四一四期（民國八十二年十月一日），頁四四一四八。

最惠國待遇地位，曾頻繁的派遣經貿代表團赴美採購，十一月，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更欣然接受柯林頓邀請，趁赴美參加亞太經合首腦會議的良機，於十九日在西雅圖同柯林頓舉行自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來首度的「中」美最高層會晤，一般認為這是中共與美國徹底改善關係的契機。

中共對美此種彈性策略對於避免「中」美關係惡化，以及確保中共的利益事實上頗富成效，在最惠國待遇上，固然由於柯林頓堅持人權而使中共喪失面子，但柯林頓應允無條件續延一年最起碼使中共贏得裡子。其次，美國在下半年派遣包括助理國防部部長在內的高級官員訪問大陸，顯示「中」美將再度恢復軍事關係。此外，在柯林頓與江澤民的高峰會晤中，柯林頓除承諾恪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外，並表示「中國有著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和世界增長最快的經濟，在全球及地區的重要事務上，美中必須一起合作」，會後柯林頓在記者會中也指出「二十一世紀美中關係將是世界最重要的關係」¹⁵，此等於美國承諾中共在國際中的重要性，也顯示「中」美雙邊關係在未來有可能較大幅度的改善。

雖然在西歐地區，中共外長錢其琛出訪荷蘭、瑞典、義大利、德國四國，同時中共也先後邀請西班牙首相岡薩雷斯、奧地利總理弗拉尼斯基和德國總理柯爾(Helmut Kohl)訪問中國大陸，其中最重要者係德總理於十一月的訪京之行，由於兩德統一使得德國版圖成爲西歐之最大，其國際地位也日益重要，而近年來德國已成爲中共在歐洲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共也成爲德在亞洲的第二大貿易夥伴¹⁶，德國對中共的投資更居歐洲國家之首位，因而基於現實利益，中共相當重視柯爾的訪京，強調要從「戰略高度看待和處理相互關係」¹⁷，在訪京期間，柯爾向中共首腦重申德國將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不與台灣發生官方關係，不向台灣出售武器，同時柯爾也表示德國支持中共恢復在GATT締約國的地位¹⁸，這些保證毋庸置疑令中共至爲滿意，也有效彌補中共同英法交惡所遭到的損失，中共也同柯爾簽署了總金額爲二十八億美元的貿易協議作爲回報，其中包括廣州地鐵、空中巴士、電力、鋼鐵、汽車等西方國家一向競爭激烈的項目¹⁹。

¹⁵ 文匯報，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二版。

¹⁶ 文匯報，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第四版，一九九三年「中」德貿易總額爲六十四億七千萬美元，超越「中」英的十九億三千萬美元與「中」法雙邊貿易之二十二億六千萬美元，一九九三年前九個月，雙邊貿易額達六十六億五千萬美元。另外，在對中國大陸投資方面，一九九三年上半年有三六八家德國企業對大陸投資，協議金額達十三億六千萬美元。

¹⁷ 文匯報，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六日，第二版。

¹⁸ 同前註。

¹⁹ Geoffrey Crothall, "Kohl, Li Sign Trade Agreemen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 17, 1993, p. 9.

四、對亞非拉世界的全方位友好對策

對照於中共同西方國家在體制與價值體系上的衝突不斷，中共同非西方屬性的亞、非、拉丁美洲國家在此方面明顯較無拮据，因而在一九九三年西方世界對中共仍挑戰不斷的情況下，中共繼續同廣大的亞、非、拉美國家發展關係，從而避免在同西方抗爭的國際環境中處於下風，就顯得格外重要。

在亞、非、拉美國家群中，一九九三年中共仍延續一九九〇年代起的政策，將同亞太周邊國家改善關係的睦鄰政策作為優先順位。在一九九二年，中共同南韓完成關係正常化，年底俄羅斯總統葉爾辛（Boris Yeltsin）訪京，雙方簽署具有互不侵犯性質的「中俄聯合聲明」，中共全方位睦鄰政策的架構初步奠定。一九九三年，中共的亞太外交工作第一個重點就是進一步落實睦鄰政策、鞏固既有的睦鄰成果。

首先，中共外長錢其琛於五月前往日本與南韓作了四天訪問。八月，中共「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喬石前往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菲律賓進行盛大的友好訪問，而外長錢其琛也在隨後赴新加坡訪問並出席東協外長會議。基本上，日本和東協國家對中共一向深具戒心，而一九九三年東北亞地區中共一向支持的北韓在上半年宣布退出國際防止核擴散條約，而在東南亞則仍存在南中國海領土主權爭奪的潛在衝突，加上一九九三年起「中國威脅論」的擴散效應，中共領導人對東北亞與東南亞地區所作的訪問就格外重要，當然不可避免的，錢其琛和喬石等人均不厭其煩的向其所訪問的東道國解釋中共的立場，希望能祛除東亞國家對中共的疑慮。另外，中共訪問的目的是希望能加強同這些具有潛力的東南亞國家的經貿關係；基於經濟性考慮，新加坡總理吳作棟、菲律賓總統羅慕斯、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副總理王鼎昌也先後訪問中國大陸，同中共簽署了大量的經貿合作協定²⁰。

其次，在鞏固既有睦鄰成果方面，中共同俄羅斯在各個領域的關係於一九九二年葉爾辛訪京的成果基礎上繼續有所進展。在經貿合作方面，中共與俄羅斯在一九九三年簽署了核能合作協議，由俄羅斯協助中共在遼寧省興建發電能力為一百萬千瓦的核電廠；中共最大的石油生產基地大慶油田也同俄羅斯簽訂了天然氣輸往中國大陸黑河、技術和勞務合作，開發俄羅斯境內油田的六個合作協定。此外，最令外界矚目的是一九九三年「中」俄軍事官員互訪與交流日益頻繁，中共海軍司令員張連忠，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先後率軍事代表團赴俄訪問，俄羅斯國防部部長葛拉契夫（Pavel Grachev）也在十一月

²⁰ 周樹春，「中國外交的東盟年」，文匯報，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第二版。

訪京，同中共官員就雙方軍事的進一步交流進行深入會談，並且同中共簽署了一項五年軍事合作協議，一般認為，雙方在未來加強武器出口與軍事科技合作是可以預期的。

中共一九九三年亞太外交的第二項重點是持續同越南和印度通過高層政治訪問和技術性工作談判解決邊境領土爭議。首先，中共與越南雙方根據李鵬在一九九二年十二月訪問越南所達成的諒解，於一九九三年八月在北京舉行第一輪外長級邊界談判，討論了解決雙方陸地邊界和劃分北部灣問題的原則，也就南沙問題交換意見，最後雙方簽署了「會談紀要」，就解決雙方邊界領土問題的基本原則達成共識。十月，雙方副外長在越南河內正式簽署解決邊界領土糾紛的原則協議，承諾無論在陸上或海上都不向對方動武^{②1}，此對中共東南邊境和東南亞的和平與安全具有明顯助益。另外，中共與印度緩和邊境緊張對峙的談判在一九九三年亦取得積極成果，透過雙方一連串工作談判，雙方終於在九月印度總理拉奧（P. V. Narasimha Rao）訪京之際簽署了「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彼此同意裁減邊境駐軍，雖然雙方仍沒有規定削減的數量和時間表，但由於協定中規定雙方邊界問題應通過和平友好方式協商解決，並且雙方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此即標誌雙方邊境緊張對峙已開始緩和^{②2}。

為確保在第三世界的聲望，以及打壓台灣的國際生存，中共並未忽視亞洲以外的非洲、中東和拉丁美洲，錢其琛在一九九三年初就立即前往阿曼、茅里塔尼亞、喀麥隆、加彭、浦隆地和盧旺達進行訪問，三月又風塵僕僕趕往墨西哥、巴西、烏拉圭、阿根廷與智利五個拉丁美洲國家訪問。七月，中共「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又率團訪問科威特、巴林、沙烏地阿拉伯、卡塔爾、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伊朗和阿曼，「人大」副委員長陳慕華也率團訪問墨西哥、巴巴多斯、圭亞那和蘇里南，通過此種進取性的外交攻勢，中共在一九九三年也成功的爭取非洲厄立特立亞同其建交，以及賴比瑞亞與其復交。此外，中共也廣邀非洲、中東、拉美國家高層人物訪問中國大陸，其中最重要的是以色列總理拉賓在九月九日同中共素來支持的巴解領袖阿拉法特締結了相互承認的歷史性和約後，旋即於十月訪問中國大陸，同中共「國務院」總理李鵬舉行一九五〇年以來第一次政府首腦會談，此也標誌以巴問題的解決使中共能夠全方位強化同中東地區國家的關係。

五、結 語

總的觀察，在西方世界的強力挑戰下，一九九三年中共外交仍是有得有失，所得者是中共的經貿利益並未因為西方的挑

^{②1} *The Japan Times* (Tokyo), August 31, 1993, p. 5. 明報（香港），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日，第十六版。

^{②2} Geoffrey Crothall, "China and India Agree to Cut Troops along Disputed Bord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8, 1993, p. 1.

戰而受到太大的影響，中共的對外貿易出口仍持續擴大，西方對中共的投資也更為熱絡，所失者是中共未能成功促使美國在人權問題，英國在香港「政制改革方案」上作出讓步，更未能成功遊說法國停止對台出售武器。換言之，中共在一九九三年的彈性靈活外交雖然促進了自身與西方經濟關係的活潑發展，但卻未能停止西方對其所謂主權的侵犯與內政的干涉。

比較觀察，中共在現階段對經貿利益的重視似超越對主權利益的重視，這也使得在一九九三年中共對西方仍持續維持「既抗爭，又聯合」的政策，同時也使一九九三年的中共外交仍呈現強烈的經貿色彩。事實上，雖然經濟快速增長為中共帶來了「中國威脅論」的困擾，然而快速增長也同時為中共帶來更大的發展契機，不但擴大了世界各國同中共加強經濟合作及對中共市場投資的意願，更促使美國及西方各國無法不正視中共的國際角色，而體認必須同中共發展積極正面的關係，這也是素無處理中國事務經驗的柯林頓總統主動邀請江澤民在西雅圖會晤的原因。易言之，一九九三年中共對外關係的趨向顯示，西方孤立中共的時代已正式結束，中共的國際地位也有水漲船高之態勢。

*

*

*